N 本期聚焦

创新主体的动力从哪里来

王东京

对“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我深信不疑，可近段时间却总在想：既然创新是发展的动力，那么创新本身的动力由何而来？绝非多此一问，前不久在一个座谈会上有科技部门的官员也说：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如同汽车的两个轮子，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创新的动力问题。

一语中的，这位官员点到了要害。是的，若不是创新动力不足，中央何必三令五申鼓励创新呢？不过仔细推敲，该官员的结论虽然对，但把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比作汽车的两个轮子未必恰当。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有个比喻更精辟：“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把这一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的点火系。”言下之意，是说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去推动。

更确切地说，是要探讨怎样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科技创新的动力。要回答此问题，首先得弄清楚科技创新的主体以及不同主体的追求目标为何。对以上问题若不清楚，体制创新便无所适从。而不知道体制如何创新，当然我们也就无法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主体是谁

学界通常认为，科技创新主体有三个：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科技人员。不知读者怎么看，我的看法，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而非科技创新主体，政府可推动科技创新但不直接从事科技创新。企业与科技人员当然是创新主体，但两者的追求目标又有不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科技人员则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

政府的创新动力从哪里来

政府作为体制创新主体，创新动力从哪里来？有学者认为是来自对民族复兴的追求。这看法我赞成。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凌辱，实现民族复兴确实是政府追求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赢得了独立，可之后三十年经济发展处处受制于人。1978年，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由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可见，政府当初推动改革，既有追求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有落后挨打的压力。然而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问题在于，政府由各级官员掌控，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已越来越多地触及官员的利益，因此我担心政府的改革动力会弱化。不是杞人忧天。读者想想，中央为何强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理解，就是提醒大家改革阻力在加大。

为何企业不放手创新

再看企业的创新动力。企业的追求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有利润最大化的牵引，照理企业应积极创新才是。可据我所知，时下不仅国企缺乏创新动力，民企也普遍创新不足。何以如此？我的解释，是技术创新有风险。经济学家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曾将企业分为三类：风险偏好型，风险规避型，风险中型。现实中由于创新失败的概率往往高于成功的概率，而大多数企业又属风险规避型，这样创新不足也就不奇怪了。

要追问的是，企业分为国企与民企。国企的创新风险由国家（或全民）承担，可为何国企不放手创新？思来想去，我认为问题出在企业绩效考核上。国企创新失败虽不用高管赔钱，但势必要影响企业当年的绩效。投鼠忌器，企业高管对创新难免患得患失。民企不同于国企，民企有创新动力，可民企由于缺乏风险分担机制，创新失败得由自己兜底，故对创新也往往会心有余悸。

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来自哪里

再看科技人员。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既来自他们的报国情怀，同时也来自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比如有人是为了发表论文评职称，有人是为了申请专利获大奖，有人是为了分享成果转让的收益。但无论出于何动机，科技人员都不会缺少创新动力。官方数据说，我国专利申请连续五年居全球之首，年均超过100万件；到去年年底我国专利拥有量已超过100万件。两个100万足可佐证这一判断。

引领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增强创新动力的重点是什么

由此看，增强创新动力，重点是在政府与企业。前面说过了，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而且体制创新要服务于科技创新，为表述方便，让我先说国企与民企，然后再说政府。增强国企创新动力，我认为关键是要让国企高管有动力。有两招：一是将技术创新（如研发投入）作为企业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二是对高管采用“工资+期权”的薪酬机制：工资与年度绩效挂钩，期权与整个任期的创新收益挂钩。

怎样推动民企创新？据上文分析，民企创新不足是因为没有风险分担机制。这是说，只要有人肯为民企分担风险，民企一定会大胆创新。问题是这种风险分担机制怎么建？我想到的是开放创新板市场。众所周知，纳斯达克（创新板）对推动美国技术创新居功甚伟，而英国1995年也开放了创新板（AIM）。别人有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听说上海正在紧锣密鼓试点，是好消息。晚开不如早开，应该尽快推开。

最后再说政府。行文至此，我想读者其实已经清楚了如何创新体制，现在的难题是谁来推动。最近社会上有一说法，认为时下有些政府官员不思改革与高压反腐有关。这看法肯定是错的。某些官员缺乏改革动力是事实，但并非因为反腐，而是改革触动到了他们的利益。以往机构改革如是，今天审批制改革也如是。正因如此，我认为体制创新要由中央顶层设计，靠中央的权威自上而下推动。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来源：北京日报

N 学者观察

破解理论宣传“十对矛盾”

陈 飞

理论宣传是推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因此，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是主流媒体的重要职责和主要任务，而这其中，主流媒体的理论宣传要着重解决好谁来写、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笔者认为，主流媒体在理论宣传中要正确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十个方面的矛盾和关系。

一是处理好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快”与媒体理论宣传“反应慢”的矛盾，要及早谋划、快速反应。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快，要求理论宣传必须主动、及时、自然跟进，及时发声、快速发声、强势发声。但实际工作中，媒体一般要经过多个环节，导致理论宣传常常“慢半拍”。有鉴于此，主流媒体的理论宣传必须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加强对形势任务和理论宣传重点的预研预判。

二是处理好作者喜欢“长篇大论”与读者喜欢“短小精悍”的矛盾，大小结合、长短结合。受传统观念和评价体系的影响，一些作者片面地认为，“文章块头大影响力才大”、“发表文章长作者水平高”。读题时代，理论宣传必须适应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少一点长篇大论，多一点“短小精悍”。

三是处理好媒体喜欢“高大上”与群众喜欢“接地气”的矛盾，少一点“高大上”、多一点“接地气”。理论宣传必须要有政治的高度、历史的厚度、研究的深度、专业的精度，但理论宣传也要有直面问题的锐度、直面现实的热度、直面当前的新度。既讲国际格局的远道理，也讲联系群众的近道理；既讲宏观全局的大道理，也讲贴近生活的小道理；既讲逻辑推论的硬道理，也讲沁人心脾的软道理。

四是处理好“正面宣传”与“解疑释惑”的关系，要针对问题搞好正面宣传、理论阐释。正面宣传不等于只讲正面的积极的一面、只讲一面理不讲两分法，不是回避矛盾困难和问题，不是不去接触群众思想上存在的疑虑困惑。而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回答群众关心的问题，解开群众思想上的扣子。

五是处理好“全面系统”与“突出重点”的关系，把“长安排”与“跟进学”结合起来，增强理论宣传的指导性、针对性。宣传党的创新理论，要突出整体性、系统性要求，着力引导干部群众在全面准确理解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深刻领会把握思想精髓与核心要义上下功夫。既有长计划作出系统全面部署，也有短安排。

六是解决好语言“呆板生硬”与“通俗易懂”的矛盾，学会用群众语言、生活语言说话。理论只有转化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才能体现价值、彰显威力。倡导作者多用群众的语言、大众的语言、朴实的语言写文章说话，运用富有时代特色的新鲜语言撰写理论文章，做到通俗易懂，喜闻乐见。

七是处理好“正确对表”与“个性思考”的关系，在确保准确的基础上给个性思考和探讨留下空间。“理论宣传有纪律”，理论宣传必须与中央的宣传口径相一致，一些重大观点、重要提法、重要评价、重要表述必须准确“对表”，在这个基础之上，给作者表述、阐述、解释、思考、探讨留下“空间”。

八是处理好“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关系，“规定动作”强调严格落实，“自选动作”要求灵活多样，“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应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一方面，理论宣传中央有统一的部署和安排，必须严格落实，做到统一号令、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密切配合；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媒体自身特色和精准的受众定位，善于设置议题，引导舆论走向。

九是处理好“不出差错”与敢于“交锋亮剑”的关系，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体现主流媒体的战斗性、原则性、先导性。理论宣传不能为取悦受众而“失向”、因盲目介入而“失准”、为吸引眼球而“失真”、为过分渲染而“失范”、为刻意迎合而“失态”。但不出差错不能成为回避矛盾斗争的借口和代名词。在关系党和人民的切身利益、涉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敢于交锋，敢于亮剑。

十是处理好“坚持坚守”与“改革创新”的关系，准确定位、保持特色、打造品牌、提高质量、扩大影响。理论宣传改革创新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开门办报，广泛征求意见，让读者、作者参与，谈感受、提意见，在策划上加强统合、在内容上加强整合、在形式上加强融合、在力量上加强联合、在阵地上搞好结合。只有在坚持坚守中保持原则品位，才能在改革创新中发展提升。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N 学有所思

阳明心学与教师担当

丁 旭

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界委员联组会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家国情怀，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做出了应有的成绩，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继续传承中国文化，为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发展献计出力。

广大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以更强烈的责任感、更积极的教育态度，恪守教师职责，努力做到知行合一，敢于实践，勇于担当。而这些，契合王阳明教育思想的要求，教师应当有独立的治学精神和娴熟的专业能力。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宁波人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发扬阳明精神，就应将它贯穿于大学教育及基础教育中。“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衡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教师应以立德作为教书育人的出发点，“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努力做到德行合一。尽管教师和学生的教育活动是双向的，但也要重视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主导作用，教师的人格、品德、精神对受教育者的示范影响是巨大的，正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优秀的师德师风能潜移默化，影响和推动学生明理向善。

王阳明“行是知之始，知乃行之成”教育思想的核心内涵，指的是教师内心要树立和捍卫正确的教育信念，若心无信念就会使思想与行为脱节。同时信念与行为要保持一致性，将信念教育落实到学科教学实践，并有效渗透到心理健康教育中，使学生在参与生活、学习、社会实践时，将头脑中抽象的理想信念转化为现实中的行动，做到知行合一。当代学生思想活跃，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有很强的可塑性，对价值的判断和选择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在校园生活中教师与学生朝夕相处，学生对教师的一言一行耳濡目染。这就要求教育者首先要强化正确的道德规范、以身作则，在教育教学的岗位中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知与行统一结合并加以示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年可持续发展教育报告《塑造明天的教育》中，提到了“终身学习”的概念：为什么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教师也要树立终身学习、主动学习的治学理念，让自己在学习中升华。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6)指出在教育信息化的当今世界，技术运用对教育的巨大变革作用。随着“云计算”和“移动学习”技术进入基础教育的主流应用，教师应当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提升专业技能，主动学习先进的信息技术，带动学生有效学习，成为学习者的帮助者、指导者、促进者与支持者。教育工作是一门实践科学，受到心理学、教育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多方面影响。教师应该积极主动地学习有助于教育教学发展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教育教学工作，“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培养知能合一，持续不断地优化教学，推进创新。

《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15年）》显示：全球仅1/3国家实现了2000年全民教育计划所有目标，青年人怠学和低龄儿童辍学仍然是当今不容忽视的教育问题。这让教育者开始警醒，必须正视教育价值观的变化。教育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认识正在逐渐转变，传统教育方式能否满足个人的“投资回报”开始受到质疑。阳明心学倡导的教育理念之一是适应环境，“后之君子，亦当素其位而学，不愿乎其外”。人要学会变通，学会适应环境，不应一味地抱怨环境。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在2017年“教师培训的历史转型”主题讲话中，提醒每位教育者都应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变了，这是一个信息文明带来的知识本位、创新驱动的新时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学习方式和教育方式。学生变了，成长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世界中，学生是e时代的“原生土著”，有与生俱来的互联网价值观，愿意也习惯于通过各种信息手段学习。家长也变了，现在的家长有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很高的教育期望，有很强的维权意识。

如果教师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教师的优势、教育的功能就难以发挥出来。“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教育者要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树立责任担当，不断在教育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充实自己，进而促进教育的更大发展。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201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面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要牢牢坚持“六个根本”，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第一任务，把促进身心健康作为第一要求，把知行合一作为第一原则，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是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殷切要求。担当是“行胜于言”“真才实干”的实践行动，传承和发扬阳明精神，教师要坚持把“知行合一”作为第一原则，善于思考、勤于学习、勇于实践、敢于担当。将知识和思考化作教学实践的动力，经常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不断总结提炼升华，进而在实践中丰富自己的教育智慧。每一位教师更要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变要我改为我要改，让知行合一产生强大力量。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教师应该是学问上站在前沿，重道义、敢担当的人类文化的传播者、学生灵魂的塑造者。知行合一，立德树人，新时代呼唤这样的人民教师。

（作者单位：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观点集粹

“特殊逆城镇化”现象正在大量产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逆城镇化”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一个概念，其本意并不是“反城镇化”，而是指城镇化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逆城镇化”可以说有三个属性：一是乡村人口的外流出现逆转，但农耕者人数可能继续减少；二是乡村居住人口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绝大多数居民成为非农从业人员；三是乡村生活复兴，改变了凋敝和衰落。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可能会出现叠加的特征，即在城镇化总体上尚未完成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和郊区化阶段的时候，“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开始大量产生，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潮流。我国许多特殊的“逆城镇化”现象，可能从严格的学术定义上看并不典型，即并非长期居住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而是在特有制度约束下形成的一些“走入乡村”“走向小城”的人口活动趋势。

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的预见性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杨雅厦在《光明日报》刊文指出，在所有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最难预测的就是不同于常规的“小概率”危机事件。在危机困境突然爆发时，管理者往往处于非理性决策与经验决策的状态，因而面临更大的风险性。大数据技术则通过GPS设备、RFID设备、视频监控设备、卫星遥感等各种传感器介入互联网终端，使自然与社会运动变化的征兆信息，以传感数据、交易数据、交互数据的方式为人所捕捉，有效减少信息盲点。在具体实践中，相关执法部门之间要加强数据资源的交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和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对社会治理相关领域数据进行归集、挖掘及关联分析，强化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的数据支撑，构建起智能防控、综合治理的公共安全体系。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需政府企业各尽其力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既需要政府多措并举继续发力，也需要企业眼睛向内下大气力。目前，企业在通过自身努力降低经营成本方面仍有较大空间。一是加强创新，加大技术降本增效力度。应提高研发效率，缩短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周期，通过管理创新、营销模式创新等不断提高要素生产率。二是加快转型升级。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推动产业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三是加强各项基础管理，加大系统降本增效的力度。引入先进管理方式和工具，推进精准精益管理，强化全员成本管控，降低运营成本，确保人工成本增长不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支出，确保营业成本增幅低于营业收入增幅。